

侯仁之燕园问学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侯仁之燕园问学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7 号

侯仁之燕园问学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7 字数 283,000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本

ISBN 7 5320-2329-X/G·2265 定价: (精)7.25 元



在燕园



与冰心师(中)合影(右为张玮瑛)

作有关北京的学术报告





在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沙坡头治沙站(1983年)



考察燕园地下的新发现

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与校长、副校长合影(1984年)





和研究生时代的导师克利福特·德贝爵士及夫人在剑桥大学(1984年)



向采访者介绍《中国地理丛书》

侯仁之简历

侯仁之 1911 年 12 月 6 日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祖籍山东恩县。中学时代三次转学，最后毕业于通县潞河中学。1932 年入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 年毕业，任助教一年，转入研究院进修，1940 年获文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1 年 12 月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侵略军封闭。他曾负责协助在校学生脱离沦陷区，遂被日本宪兵逮捕。转年 6 月，日本军事法庭判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寄居天津，无迁居旅行自由。为摆脱敌伪的继续纠缠，他曾在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任教。1945 年秋抗战胜利后，侯仁之于 1946 年夏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专攻历史地理学，曾任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1949 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兼程回国，先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又兼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 年夏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文革”期间被停职审查，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两年。1978 年恢复教学工作，兼地理系主任至 1983 年。此后继续任教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自 1952 年至 1985 年他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又被选为沙漠分会名誉会长。1985 年应聘为国际地理学会联合会(IGU)及科学的历史与哲学国际协会(IUHPS)所属地理学思想史专业工作委员会常任委员。在此期

间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59年迄今，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0年春侯仁之应邀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翌年春再次应邀前往，前后在两国十余所大学作学术报告。1981年冬至1982年春作为福布赖特学者^①到伊利诺大学(厄巴纳)地理系讲学。1984年作为路斯基金学者^②应邀到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进行研究，同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此外，1980年至1987年他还三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侯仁之首先在我国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从而开创了我国城市历史地理与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研究的新领域。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的研究上。他还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除应邀担任一些科普读物的主编外，还自动从事科普创作，力求深入浅出。1984年被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荣誉会员。他已出版专著5种，主编重要图书4种，发表专题论文78篇，英文论文6篇，以及有关教育、科普、传记、游记等方面的文章近百篇。迄今他虽年逾古稀，仍勤于研究和写作，并继续主持集体的科学研究工作。目睹后起之秀，为发展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新方向而合衷共济、共同前进，这是他所引以自慰的。

① 福布赖特学者：“Fulbright”基金由美国政府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而设立。由福布赖特基金资助应邀前去美国讲学的外国学者，简称为“福布赖特学者”。

② 路斯基金学者：路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由出生于中国的Henry·R·Luce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所倡立。由路斯基金会资助应邀前去美国讲学的中国学者，简称为“路斯基金学者”。

介 绍

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业余协作小组

—

伟大的母爱对每一个幸运儿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这对侯仁之来说也全不例外。可是母亲的早逝，却又使他在极度的悲恸中萌发出一线新的生机，从而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进一步成长起来。这似乎是难以令人想象的，然而却是事实。

仁之出生时，母亲年近40，因是长子，父母喜出望外，遂取名光临。两年之后，小弟又来到人间，更是难得，因而起名叫重临，学名硕之。母亲对两个孩子的培养，很有独出心裁的地方。从几时起就引导他们养成劳动的习惯。例如在住宅院子的一边，教他们架起篱笆，种植瓜豆，每个人各管几畦。又把院子里的两条砖砌的甬路比做两条铁路，两人各自清扫一条，进行比赛。她还给两个孩子各准备了一个洗衣物的小洋铁盆和一块小搓板，小件衣衫和袜子都要自己去洗。更重要的是母亲十分注意孩子的学习，并严格要求他们要爱惜书籍，绝对不允许在书本上乱写乱画。除去学校课本之外，还为他们准备了不少课外读物。因为父母都信奉基督教，曾为他们订阅了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儿童刊物《福幼报》。母亲还亲自为他们讲述了一些《旧约圣经》中的小故事，这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很有好处。进入初中之后，仁之参加学校的讲演

比赛，获得第一名。母亲十分高兴，特地写信鼓励他，并且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教师。可是就在他初中毕业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母亲因病逝世，兄弟二人遭受了这一灾难性的打击，几乎不能自拔，仁之思念母亲心切，念念不忘的是母亲的一些教导，经常回忆起母亲曾经讲过的一个名叫基甸的爱国青年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旧约圣经》，有个主题就是“被俘虏的要得释放，被压迫的要得自由”。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他决心试着要写一个剧本，就叫做“基甸救国”。他选择了剧本的写作形式，是因为他在初中二年级的课余活动中，参加演出过一个话剧《山河泪》（剧本作者侯曜，商务印书馆出版），也同样是描写爱国青年反抗侵略者的故事。结果剧本《基甸救国》写成了，而且还被人拿去刊登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鲁锋》杂志上。就是这样，对母亲深刻的怀念，竟然化为一股新的动力促使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成长。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他在初中一年级的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读到了女作家冰心的《超人》。这本书和他过去所接触到的儿童读物大不相同，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深深地打动了，就好像把他引进到一个生活中的新境界，从而启发了他对新文学的爱好，同时也就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基甸救国》能够顺利脱稿，和此事不无关系。到了高中时期，他有了更多的课余写作的机会。在德州博文中学时，曾被推选为《博文季刊》的主编，并发表过长篇文章。转学到通县潞河中学后，又曾用笔名连续为学校刊物《协和湖》写稿。他高中最后的那一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入侵东北三省。他积极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学生军事训练，并代表学校参加全城的抗日宣传讲演。但是在反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压力下，学生的爱国运动未能继续下去。

二

“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侯仁之的生活方向，但是现实的道路却只有一条，那就是继续升学。

他曾想到当一名教师，父亲却要他学医。可是现实的教育，又使他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在1932年1月份的《中学生》杂志上，读到了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的一篇短文，鼓励青年奋发图强，去从事唤醒民众的工作。同一期又有宋佩韦的一篇文章，说明日本入侵东北和历史上海外民族的南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这都使他深受教育，他开始考虑如果升学，究竟是去学医还是学历史。这时弟弟写信建议说：“学医只能为个人治病，学历史却能为社会治病。”还说鲁迅和郭沫若原来都是学医的，但是他们却终于以文学创作和历史的研究，投身到救国的事业中去。于是他决定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一所高等学府，在学生中却有着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传统。图书馆旁边、在丘岗环抱的花木丛中，耸立着“三·一八”爱国运动中死难的同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寓意深长的铭文，给初入学的侯仁之，上了校园里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课。此后，为了支援当时在长城沿线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将领和士兵，相继在校园里发起了“万顶钢盔运动”“万斤咸菜运动”，最后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切都对他很有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期间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从洪业(煨莲)教授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治学训练，从而开拓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受到顾颉刚教授在中国沿革地理讲授中所倡导的务实思想的影响，并积极参加顾颉刚教授创办的“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当时顾颉刚亲自主办了“通俗读物编刊社”，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

抗日救国的宣传，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个人的学业探索中，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及其奋斗终生的事迹，曾使他深受感动。加之当时国难日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例如1935年夏长江中下游大水灾就震撼了他，为此他写有专文，揭露政府的贪污腐败是导致水灾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后他十分重视水利问题的研究，并依据清初治理黄河颇有成就的史实先后写成了《靳辅治河始末》和《陈潢治河》两篇文章。前者是他的毕业论文，刊登在《史学年报》上，后者带有科普论文的性质，发表在《大公报》的《史地周刊》上。1936年夏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并立即参加了由禹贡学会所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既加强了实地考察的业务训练，又提高了组织工作的能力，收益是很大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又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在此期间，除去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和《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外，又写成了《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论文，作为《燕京学报专刊》出版。到这时候，他的导师洪业教授向他明确指出，他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历史地理学，并且为他安排了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去进修的计划，可是由于当时欧洲处于战争时期，只好暂缓成行。因此1940年夏在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就继续留校担任教学工作。

三

侯仁之留校任教时，燕大处于沦陷区已历三年。因为是美国教会大学，日本侵略者未加干涉。他当时兼任学生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除去帮助学生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问题外，还在暗中负责协助自愿参加抗日工作的学生，脱离沦陷区，有的去大后方，也有人就近去西山里的解放区。1941年12月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封闭，他和一些师生先后被捕。1942年6

月日本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没有迁居旅行自由，而且要随传随到，他只好随妻子寄居天津岳父母家。其后为了避免敌伪的纠缠，他便在法国天主教所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任教，还兼任了该校女子文学院的史地系主任。这时他除去教学以外，还尽可能把在燕大时已经开始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一文的写作，同时又利用可以就地考察的有利条件，写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作为工商学院的研究丛刊出版。

在此期间侯仁之的生活中发生了一桩很大的不幸，他的弟弟硕之在内地惨遭杀害。硕之在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他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感兴趣，曾利用苏联建设画报向近在燕大的仁之，详细介绍第聂伯大水电站的建设情况，他很相信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的理想之一就是有朝一日能在黄河上兴建大水电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校迁往昆明，毕业后又只身北上，1942年遇害于陕西凤翔。他是个博学多才的青年，天文、物理、文学、历史和哲学无不涉猎，高中就读于天津新学中学，该校以英文教学见长，他得到了很好的训练。课余之暇，经常从事译述工作，除去用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翻译文章之外，还完成了一本通俗天文学的翻译，被上海开明书店纳入《开明青年丛书》出版。硕之十分喜爱从事科普读物的写作，并且主张写作时必须深入而后浅出。这一点对侯仁之也是很有影响的。可是仁之再也料想不到自己在沦陷区出狱不久，就传来了弟弟在自由的国土上竟被杀害的噩耗。他闻讯之后，食不下咽，睡不成眠，幸而得到煨莲老师的亲切关怀，并且启发他说：“弟弟的专业你不能继承，可是他从事科普写作的志愿，却是你可以继承的。”正是老师的这一番教导，使侯仁之重新振作起来，生活下去。此后不久，他应工商学院学生俱乐部的邀请，作了一次以“黄河故事”为题来讲述治理黄河的科普报告，并且着重指出在与

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惜自我牺牲的人，也同样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事后学生们的热情反应进一步鼓舞了他继承亡弟遗志继续前进的决心。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侯仁之按预定计划于1946年夏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就读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德贝教授(H·C·Darby, 今为 Sir Clifford Darby)^①。德贝教授对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明确指出地理环境主要是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要了解当前的地理环境，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地理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了解当前地理环境或其中某一个单独的地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也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其现状。从理论上讲，今天的地理现象，明天即属于历史地理。德贝的理论及其对英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贡献，给侯仁之以极大的启发和帮助，使他得以在新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从而把过去在探讨北京城市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大量事实，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1949年夏他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正好赶在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前三天回到北京，并且有幸参加了天安门前隆重的欢庆大会，这使他深受鼓舞，永远难忘。

五

侯仁之回到北京后，立即投入燕京大学的教学工作。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建议把教育部规定的大学课程中的“中国

① 在英国地理学家中因学术成就而被封为爵士(Sir)的，德贝教授是第三人。

沿革地理”，根据新的内容，改为“中国历史地理”。以此为起点，他不仅介绍了西方先进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还通过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把新的理论和观点引进到研究工作中来，这在他所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有所表述。有评论说：“把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创者，是侯仁之。”^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使侯仁之感到激动的就是重新建都北京。他应邀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下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负责为规划工作提供有关北京城市发展及其在历史上规划建设的基本资料，同时还根据要求进行一些专题研究。例如他的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就是1950年针对西郊园林区应如何利用和开发的问题写成的。这时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副主任还请他兼任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教授，主讲“市镇地理基础”课程，这又给他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机会，从而开拓了他的研究领域，增强了他理论联系实际信念。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还被选为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繁重的教学行政任务以及不断增加的社会活动，使他不再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与北京城市建设有关的研究。例如1955年他所发表的《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中，最先提出了水源的开发历来是北京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后为纪念建国10周年，《文物》月刊征文于他，他又第一次提出北京最初城址的建立和发展与太行山东麓古代南北交通线和永定河上卢沟桥古渡口的关系，从而为探讨北京原始聚落的起源及其在南北文化交

^① 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流上的枢纽地位，作出了重要的科学阐述。

这一时期，他第一次在大学地理系培养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并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小组。他还结合国家改造沙漠的任务，连续数年亲自带队深入西北半干旱区和干旱区进行考察，以大量的新发现，揭示了2000年来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所导致的沙漠化的原因，这就为相继而来的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为了提高学生对于祖国传统地理学的成就和发展的认识，他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课程，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和《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热心于科普读物的写作，兼任过《地理学报》和《地理小丛书》的主编。

从1955年6月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侯仁之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1958年起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这一兼职的关系，他于1965年夏主持完成了一项有关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对排除城市建设中的隐患十分有利。此后他又接受了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任务，其实早在他从事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时候，就主动提出过这项任务，并且得到了梁思成副主任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只是由于院系调整后教学任务繁重，无暇兼顾及此。这一次市领导重新提出这件事，他欣然接受。可是工作刚刚开始，他便下乡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乡未及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他失去了自由。这项科研任务因此耽搁了十多年，直到1979年他负责指导的研究生入学后，才得重新开始。这是他近年来所主持的一项最重要的集体科研工作，历时近八年才得完成，于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北京历史地图集》。在此期间，他还将1979年以前陆续发表的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写作以及在沙漠考察和城市研究中的论文，汇编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